

探春形象及其悲剧 意义的考论

张 艳

内容提要: 对于《红楼梦》人物的研究一直都是学界的关注所在,尤其是对探春等主要人物的研究,除了文章之外,也不乏专著专章的探讨。然而正如同《红楼梦》其它主要人物的研究一样,关于探春形象的分析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因此本文立足于原著对这一形象进行客观的解读,并在探讨这一形象的本质特征的基础上,展开对于探春命运悲剧的文化成因的探讨。

关键词: 嫡庶 悲剧 牺牲

《红楼梦》一书,诚如鲁迅所言“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正因此愈可见出《红楼梦》之气象万千,非一言可以蔽之。也因而存在许多争论,特别是对于书中主要人物的争论,甚至形成派别之争,如拥薛派和拥林派。争论的存在证明了作者所创作的人物形象之内涵深度。这种争论同样存在于对探春这一形

象的看法上:对探春的能力论者多予以褒扬,谓其人“春华秋实,既温且肃;玉节金和,能润而坚。殆端庄杂以流丽,刚健含以婀娜者也”^②;对探春的贬斥则集中在嫡庶的问题上,谓其对嫡庶观念有着强烈认同,“攀荣附贵,纵然丧尽人格也在所不惜”^③。这一分歧让我们看到了探春作为嫡庶制度下的受害者,其人生处境的矛盾以及由此而加重的命运的悲剧色彩。

一、探春形象的内涵:嫡庶制度下的受害者

用接受美学的观念来看,文本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便不属于作者,而是属于读者。作品的意义是在读者的理解中产生的,不同阶层、不同时代的读者对作品的解读里或多或少地带有个人的生命体验和文化心态。然而我们也不能否认另外一个事实,那就是作家或者读者的意识、个人的心态产物同时又是历史文化影响下的产物。

嫡庶之分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的。就古代的婚姻制度来看“昏(婚)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昏义》);而妻妾制度又是婚姻制度的附生产物“妾,接也,言得接见君子而不得伉俪也。”(《汇苑》)即从表面来看,妻妾的实质乃是一样,即服务于“君子”(男性);然而妻妾之间又有着不可逾越的等级差别:妾只能与丈夫亲昵,却没有资格称“伉俪”(夫妻),而夫妻之间至少是“同尊卑”(《礼记·昏义》)。可见,妻妾之分是男权社会为了更好地实现家族利益、繁衍后代等各种现实需求对服务者所作的规范之举。然而既成规范,便根深蒂固,如《大清律》注上便说妻妾“贵贱有别,不可紊也”,基于这一文化背景,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书

中有王熙凤制止赵姨娘管教其子的情节“他现是主子,不好了,横竖有教导他的人,与你什么相干”^④(第20回)。盖按照礼法的规定,庶出的子女已属于统治阶层,但其生母的奴役身份却并未因此发生变化,子女只能认正室夫人为母,因此赵姨娘听了这番训斥便“不敢说话”,可见当时的社会规则即是如此。而书中写探春虽然力求向王夫人等靠拢,但观其言行举止,却也只是在社会规范和伦理的范畴之内行事,并未有谄媚、屈从等“丧尽人格”之举;尤其是抄检大观园一役,探春尽了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尊严(包括利益),足见其为人及风骨。探春对于赵姨娘固然有着“阴微鄙贱”(第27回)的批评,但就赵姨娘的举止来看,也并非夸张之词;且同样是批评,探春批评赵姨娘常常表现为声泪俱下,大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意思,反观王夫人和凤姐儿对赵姨娘的言语,却多是忌恨和打压,其中内情颇可玩味。可见探春与赵姨娘关系的畸形表现实在是特定社会里的特定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如果我们以今天的立场去苛求那个时代的人,无疑是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

探春虽然“才自精明志自高”,但正如她所感慨的那样“我但凡是男人,可以出得去,我必早走了,立一番事业,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偏我是女孩儿家,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第55回)在那个时代里,女子不能“立一番事业”,只剩下婚姻这唯一的救赎之道。而就婚姻而言,也如凤姐所说“虽然庶出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时,如今有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多有为庶出不要的。”(第55回)可见“庶出”的出身之于探春竟是原罪,无处可避。而宿命阴影笼罩下的人生注定是辛苦的,所以探春处处留意,谨言慎行,日常生活中便吃个油盐炒枸杞芽儿也不忘打点一番;贾府夜宴,众姐妹都困乏散去,只

有她还撑着,让贾母叹息“可怜见儿的”(第76回),这些举止里透出一个少女的惨淡经营,因此我们说探春是嫡庶制度下的受害者,而并不是处心积虑的投机者。作者写妻妾制度影响下的母女关系这一笔较之写妻妾制度下嫡庶关系更为深刻,因为作者不仅写出了这一制度的残酷性,更揭示了其虚伪性。这一等级制度不仅不符合自然情感,甚至与那个时代的道德伦理相违背,如传统所重视的“孝”道。从这个意义来说《红楼梦》真可谓“是中国专制制度里社会人生的一面镜子,我们可以从中看见中国社会生活中各个阶层、各类人物的生存挣扎、思想矛盾、精神困窘,更可以从中学领悟到中国宗法伦理基础上的伦理主义文化和专制主义社会所包含的深刻悖论”^⑤。体察这种悖论的存在才能够真正理解作者笔下探春母女的角色内涵。

二、探春命运的悲剧意义

1. 家族的牺牲

探春的归宿从前八十回的暗示里可以看出诸多端倪:“必得贵婿”(第63回)的杏花签和“远适之谶”(第22回庚辰双行夹批)的风筝灯谜暗示探春虽嫁贵婿却又终身远离故园,正是虽“贵”却适足以“哀”。探春婚事的决定者显然是贾府的长辈们。平心而论,对于探春,贾府的长辈们是有着足够的重视的,即以贾政和王夫人而论,也绝非是出卖儿女的恶人。然而贾政固然不会出卖儿女,却未必不会牺牲儿女。毕竟,“牺牲”一词在古代中国常常被挂上各种堂皇的名目,名目的崇高有效地掩盖了牺牲的本质,因此反省和批判都显得极为稀少。如贾政的长女元春即以“贤孝才德”的名目被送入宫中,于是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宫中生活

必定是“大福”(第65回兴儿语),即使有所体悟,也常常选择回避,因为直面则意味着价值观念的颠覆。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尚不具备这种自觉。不独《红楼梦》,《儒林外史》里也有深刻的一笔,写王玉辉鼓励他的女儿自杀殉夫,其理由便是因为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儒林外史》第48回),虽说其后每念及女儿便“转觉心伤”,但情感的触发终究还是没有动摇意识的根基。贾政在元春省亲时亦体会到女儿的悲苦,但还是“含泪”劝说女儿“自加珍爱,惟业业兢兢,勤慎恭肃以侍上,庶不负上体贴眷爱如此之隆恩”(第18回)。“贤孝才德”的元春被送入宫中,皇室与贾府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因此可以推想,贾府对待探春的婚姻也会做类似的处理。国外曾有学者指出古典贵族之家所培养的“才女”,她们“不是儒家文化权力运作的受害者,而是有份操纵这一权力的既得利益者”^⑥,此言似有夸张。如果说“才女”们曾拥有过既得利益,那也仅限于和男子一样有受到教育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她们可以摆脱对男权和父权的依附性。这些出身于书香门第、上流社会的才女们,本身体现出的是儒家士大夫之家文化的优势,但她们及背后的家族都在体制之内,只能运用既有的资源,为自己争取更大生存空间的可能性并不大。

探春的远嫁也许是出自被迫更也许是出于自愿:出自上意,贾府自是不敢抗旨,而贾府主动送出女儿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世说新语·贤媛》中载有一则故事:“(周)浚过汝南李氏。李氏……有女名络秀,……浚因求为妾,父兄不许。络秀曰:‘门户殄瘁,何惜一女!若连姻贵族,将来或大益。’父兄从之。遂生伯仁兄弟。络秀语伯仁等:‘我所以屈节为汝家作妾,门户计耳。汝若不与吾家作亲亲者,吾亦不惜余年!’伯仁等悉从命。由此李氏在世,得方幅齿

遇。”这里络秀主动提出嫁入豪门为妾以求娘家得到荫蔽与提携,即是出于“门户计”的现实考量,何况彼时的贾府已是“末世”,在面临家族危机之际主动献女也并不突兀。元春和探春姐妹二人的判词里,都有“告爹娘”之语,然而曲词里并无对爹娘包办婚姻的怨怼之情,却充满了对骨肉家园的惦念和忧心,这一态度指向的是比包办婚姻更深刻的包办意识。即在当时的社会意识里,皇室之于贾府,贾府之于探春姐妹,都被笼罩在“君臣父子”这一题目之内。而所谓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秩序,在其早期尚体现为一种双向的要求,然而在历经几千年后已僵化为不允许任何质疑和调整的发生,这种绝对的权威可以随意决定个人命运,也可以轻易地扭曲、压倒人性,所以贾政那“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的理念灌输在元春姐妹的意识里,便转化为对父权的恭敬顺从,即使“泣涕”悲伤,也能够秉承“怨而不怒”的传统,反而劝慰双亲保重残年并早日抽身退步。元春和探春姐妹婚姻悲剧的深刻性正体现了戴震所谓的“以理杀人”之所以“严于商(鞅)、韩(非)之法”,就在于以“理”杀人能“使人不觉”,^⑦甘愿牺牲。

2. 政治的牺牲

探春的结局在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乃是远嫁异域,“杏元和番”^⑧。和亲,作为封建时代常有的政治举措,就现实效应来说,应该说是不错的选择,如清朝时满蒙联姻即很密集;然而在传统士大夫内心深处,常视之为耻辱,这与传统的婚姻观、更与传统的民族观有关:华夷之辨早在先秦之际就很明确,如“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论语·八佾》)、“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也”(《孟子·滕文公上》)等;有时候,更也许与国格有关。即出于怀柔四海的需要可以视华夏如一家,但要与“蛮夷”结为两姓之好也

认为有失体面。如唐朝戎昱有《咏史》(也叫《和蕃》)诗一首“汉家青史上,计拙是和亲。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岂能将玉貌,便拟静胡尘。地下千年骨,谁为辅佐臣。”这首诗讽喻痛切,指出国家兴盛靠的是清明的朝廷,用女色求得国家的和平是荒谬的。唐宪宗时曾有大臣持和亲之论,宪宗便背诵此诗,于是大臣们不敢再议和亲。然而《红楼梦》一书写的却是“末世”,“赔了夫人又折兵”虽然很令人羞耻,但往往也是不得不为之。和亲对于当事人来说更是命运堪怜,和亲的女子,多半是皇室千金或是贵族小姐,金尊玉贵的她们一旦被送往他乡,要面对的生活、文化、心理等问题都是难以想象的难堪,如汉代细君公主和亲后所作诗歌“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又如昭君远嫁匈奴,又不得不依照游牧民族“父死,妻其后母”的习俗先后嫁于两代单于。也正因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和亲文学其基调皆是悲哀凄苦的。探春的远嫁和番,就家族而言,是贾府送给朝廷的献礼,力求恩宠不衰;在朝廷而言,是当政者送给强敌的贡品,以求政权安宁。姐妹二人的婚姻皆是看似尊贵无比其实却充满凶险,这是对贾府众人也是对皇帝的嘲讽:贾政固然有舐犊之情,然而在面对家族的压力面前还是选择了牺牲女儿,皇帝看似仁民爱物,但面临危机却又将弱女子抛出以卸责。就时代而言,作者批判的锋芒无疑是尖锐而大胆的。

3. 人才的牺牲

曹雪芹写作《红楼梦》不是为“伤时骂世”,却是深深的忏悔,也因此作者所念念不忘的是寻找所谓的“补天者”。作者在对男性世界深深失望后将眼光投向脂粉队伍,最初所属意的也许是秦可卿和王熙凤,夸赞前者是个“极妥当

的人”(第5回),后者是“脂粉队里的英雄”(第13回),但随着生活画卷的展开,这二人一个沉溺于情欲,一个沉溺于金钱和权利,不仅没有挽救家业倾颓,反而迷失了自我走向了毁灭。故而作者的眼光投向了探春,对探春的描绘可谓是浓墨重彩:探春所居之秋爽斋不仅阔朗,且陈设雅致,品格大方;大观园中才女甚多,发起并组织诗社者却是探春。探春的能力也被家族所称道:王夫人被贾母错怪,她站出来委婉陈词,片言释纷;去赖大家的赴宴,众人皆知吃酒取乐,只有她留意钱财出入;掌管家务时,探春才具不亚于凤姐,而又更为公正;抄检大观园,探春秉烛而待,义正辞严,制止刁奴生事,凡此种种可见其“看得透、拿得定、说得出口,办得来,是有才干者”(戚序本第35回总评)。然而,随着邢夫人的心生嫌隙,加之王夫人又偏听偏信,探春理家只如昙花一现,贾府的人事关系、家政秩序等亦混乱不可收拾,此时最清醒的仍是探春:“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从外头杀来,一时是杀不死的,这是古人曾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第74回)后人于此深为叹息:“惟其不令(探春)嫡出,……使之徒负奇才,虽众知其能,而信任终不能专,见用终不能久,远嫁而去。”^⑨

“信任不专”,此四字看似简单,却是几千年的痛史。在儒家的教育下,文人视国事如家事乃或更重,即使身在山林,也时常心存魏阙,然而“信任终不能专,见用终不能久”的命运早在屈原那里便已上演,司马迁痛苦思考后得出的也是“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报任安书》)的结论。而有清一代,汉族文人在异族统治者面前更是做奴才亦不可得,乾隆皇帝曾责骂纪晓岚“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

蓄之，尔何妄谈国事”（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这一态度带给精英人士的难堪和尴尬不言而喻。探春虽能干但却是庶出，在王夫人眼中看来大约也只是一个得力顺手的工具而已，“见用”通常很难持久。也因此抄检大观园之时，反应最激烈的即是探春，激烈可见其痛心，而痛心却正是源于关心。王蒙曾经指出，抄检大观园时探春的激烈控诉显然是代作者发言^⑩，而我们认为曹雪芹选择探春发出此言显然是有其主观深意的：据清宫史料记载，曹家因为康熙第八子胤禩、第九子胤禧“藏贮镀金狮子一对”^⑪，即被雍正猜忌。曹家作为满族包衣奴才，与皇室关系向来密切，但当皇室内诸子夺嫡之际，曹家便身不由己地被划入另册别派，正如探春在嫡出一系那里始终“信任不专”一样，这些类似的委屈想来也是能够刺激曹雪芹对于家庭内部嫡庶派系的纷争有着更深度思考的诱因。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看出《红楼梦》写一家之事同时也写了天下国家之事。脂砚斋在评《红楼梦》时叹息“使此人不去，将来事败，诸子孙不至流散也，悲哉伤哉。”（庚辰本22回）可见在作者眼中，探春远嫁不仅是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贾府的悲剧。由于文化上的差异，探春的性情文字、经济文章放诸蛮夷之地难免要投散闲置。正所谓“有命无运”，脂砚斋曾指出“裙钗尚遭逢此数，况天下之男子乎？……家国君父事有大小之殊，其理其运其数则略无差异。知运知数者则必谅而后叹也。”（第一回甲戌眉批）可见作者的叹息不仅是针对探春一女子而发，而对于智识精英来说，怀才不遇也还可以“楚才晋用”来排遣，然而楚有才，晋亦不能用，则更是无可逃避于天地之间的悲哀，对于探春来说其“高情不入时人眼”，固然可称是薄命司中人，而探春的远嫁对于贾府来说，则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鉴于此，我们可以说《红楼

梦》表面上描写的是每个人物的个人命运,实则是对整个民族文化命运的暗喻。

结语

古人有“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说法,即理解的过程是理解者个体体验及其意识先结构相结合的一个过程。对于小说人物形象的理解更是如此,深受各种如文艺的、审美的、历史的、道德的“先入之见”的影响。然而正如解释学家、美学家伽达默尔所说“对一文本或艺术真品意义的发现是没有止境的,这实际上是一个无限的过程。不仅新的误解被不断克服,而使真义得从遮蔽它的那些事件中敞亮,而且新的理解也不断涌现,并揭示出全新的意义。”^⑫《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因此我们有必要将之与中国古代多种文化现象相互联系进行研究。实现文、史互证,以求从现象深入到本质,为《红楼梦》研究另辟蹊径。

注释

- ① 鲁迅《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45页。
- ② 涂瀛《红楼梦论赞》,一粟编《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页。
- ③ 李珊《探春形象新解》,《韶关大学学报》1997年第3期。
- ④ 曹雪芹著、黄霖校理《脂砚斋评批红楼梦》,齐鲁书社1997年版,以下《红楼梦》引文及脂评,未作特别说明者,皆自成本,不再一一注明。

- ⑤ 马小朝《历史与人伦的痛苦纠缠——比较研究中西悲剧精神的审美意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18 页。
- ⑥ [美]高彦颐《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李志生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7 页。
- ⑦ 戴震《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第 188、275 页。
- ⑧ 探春的结局，根据蔡义江、梁归智等人的分析，是在贾府事败前远嫁海外作王妃，一去无回。见梁归智《探春的结局——海外王妃》（《石头记探佚》，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⑨ 西园主人《红楼梦论辨》，一粟《红楼梦卷》，中华书局 1963 年版，第 203 页。
- ⑩ 王蒙《王蒙话说红楼梦》，作家出版社 2005 年版。
- ⑪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 ⑫ 转引自阎国忠主编《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伽达默尔》，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95 页。

（本文作者：复旦大学中文博士后流动站；邮编：200433）